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路径与机制

——以张家界为例

麻学锋 周华 谭佳欣 张登霞¹

（湖南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以张家界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算 1998—2018 年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旅游地成长和高级别景区耦合阶段及水平，揭示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路径和作用机制，为区域更好地利用旅游地成长规律和有效开发高级别景区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①耦合协调度从 1998 年的 0.395 提升至 2018 年的 0.912，实现了从失调阶段向优质协调阶段的转变。②张家界区县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具有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表现为永定区与武陵源区的耦合协调度远高于慈利县和桑植县。③耦合路径主要分为自然路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差异化发展路径。④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过程既有内部作用机制的影响，还会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政府政策等外部作用机制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旅游地成长 耦合路径 交通区位 政府政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1）06-0205-08

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至今已有近 30 年，其内部关联作用机制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而全域旅游实践亟需对旅游地成长及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关系进行理性认知。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9 年 3 月底发布《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取得阶段性成效，推动景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旅游地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已有研究认为影响旅游地成长的要素有：政府的支持^[1]、可进入性^[2]、吸引物与娱乐设施^[3]的水平。国内对旅游目的地成长动力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资源禀赋、旅游需求、政府政策三个方面^[4-7]。虞虎等发现成长型城市旅游地的休闲旅游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协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8]。大多数国内外学者针对高级别景区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地客源市场的空间分析和测定等领域，如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9]和游客流空间结构^[10]等。王明利基于 GIS 技术，认为我国高级别景区空间特征主要呈“三核”凝聚分布形态，地貌、地势、区域可达性等因素对高级别景区空间结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11]。而在耦合协调方面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旅游业和城镇化之间协调度的考量^[12-14]。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空间格局^[15-19]的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集中于定性研究和静态研究，缺乏以系统的观点对二者之间关联进行详细分析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也多停留在空间横向分析，对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之间的耦合路径和形成机制研究等问题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以“旅游立市”的张家界市为例，通过构建耦合模型，测算 1998—2018 年张家界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度，揭示二者之间耦合变化过程，以深化旅游地成长与高

¹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4）；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JJ40143）；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01108）

作者简介：麻学锋（1970-），男，湖南凤凰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E-mail: maxuefeng90@163.com

级别景区形成规律的研究，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1 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发展理论框架

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发展始于旅游地的成长过程，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描述旅游地演化规律的重要理论，是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系统的理论根基。Butler 提出“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型^[20]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被引入我国，经过大量学者的实证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相关结论：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成长呈现阶段性耦合特征。

旅游地系统初期以自组织的形式从均质无序演化为有序的演变阶段^[21-22]。伴随无秩序的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可持续性发展^[23]。在旅游地发展成熟期，要求从社会不同圈层的需求角度出发，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通过锻造产品特色，对比同类产品更具比较优势^[24]。由于旅游目的地自身资源基础条件不同，故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同。借鉴已有研究对于张家界旅游地成长和产业结构关系的成果^[25-26]，结合旅游地系统和高级别景区系统耦合过程进行动态分析，将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时期划分为以下阶段，各期耦合的特征明显不同。

2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耦合系统发展的内在机理

旅游地成长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重要体现之一。高级别景区决定旅游流的方向和目标市场的选择^[27]。“耦合”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相互影响甚至协同的现象^[28]，地理学者借鉴这个词来表述人与地之间、不同社会系统以及不同自然系统之间由无序趋向有序的协调状态。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之间的作用关系包含了两个方面：旅游地作为承载景区的载体，为高级别景区形成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高级别景区作为旅游地成长的增长极，通过“点—轴”的发展模式与区域内其他景点建立互通关系，对旅游地产生协作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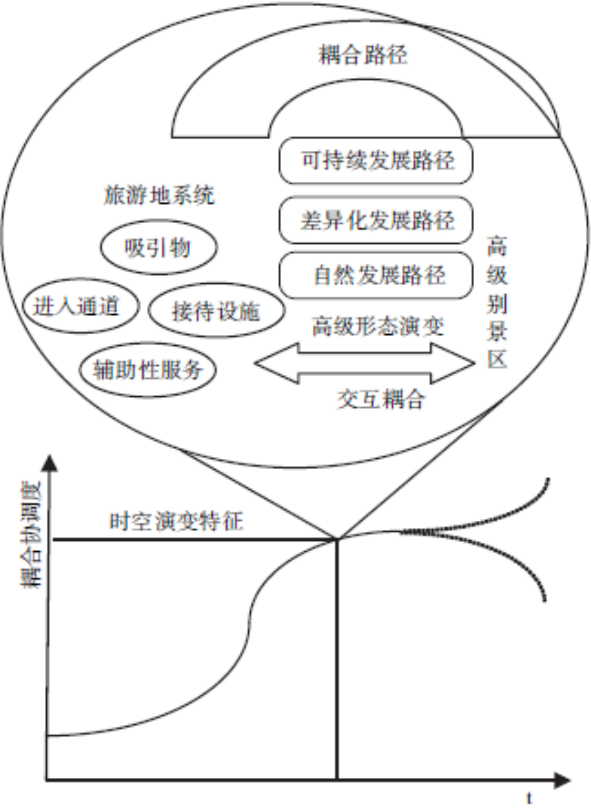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地系统与高级别景区系统耦合机理

综上所述，吸收借鉴以上理论的核心思想，将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系统表征为一个非线性、具有多重耦合特征与路径的复杂巨系统，并揭示其演化机理（图 1）。①旅游地系统。旅游地系统包含了 4 个要素：吸引物、接待设施、进入通道以及辅助性服务。②耦合关系。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作为两个复杂的系统，内部含有多个要素，系统之间交互耦合，彼此作用。③按照开发重点和采取策略不同将二者的耦合路径分为以下三条：自然发展路径、可持续发展耦合路径以及差异化发展耦合路径。④旅游地成长和高级别景区形成过程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呈现出阶段性耦合特征。

3 研究方法 with 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张家界因旅游建市，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民族历史底蕴丰厚，旅游业已经成为张家界市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经统计，1998—2018 年，张家界三大产业结构比重由 25.7：19.1：55.2 调整至 10.2：17.7：72.1，旅游收入逐年增长，推动当地 GDP 从 58.5 亿元增长到 578.92 亿元，旅游总接待人数由 1998 年的 207.55 万人次到 2018 年的 7959.55 万人次。目前张家界市已拥有武陵源风景区、天门山风景区两个 5A 级景区，黄龙洞、索溪峪等 9 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其他 10 家 3A 级景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张家界市，考察期为 1998—2018 年，数据来源于张家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张家界统计年鉴》。同时，对于无法直接获取的数据，在借鉴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插值法对指标进行赋值。

3.2 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对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其次按照引用频率的高低，本着指标选取的主导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张家界发展现状，在 CNKI 数据库中选取有关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测度的 5 篇文献^[29-33]，找出相符合的指标；最后在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下，进一步调整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3.3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引用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建立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模型^[34-35]。首先采取线性加权法评价张家界市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公式为：

$$\sum_{j=1}^p \lambda_{ij} = 1, U_i = \sum_{j=1}^p \lambda_{ij} \mu_{ij} \quad (1)$$

式中：U₁、U₂ 分别是旅游地系统和高级别景区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μ_{ij} 为第 i 个系统中第 j 项特征的指标值；λ_{ij} 是第 i 个系统中第 j 项指标的权重。为避免指标量纲或测度量级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处理。权重采用比较客观的变异系数法确定，公式如下：

$$C_i = \sigma_i / \bar{X} \quad (2)$$

式中：C_i 为 i 项指标的权重；σ_i 是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差； $\bar{X}$ 是第 i 项指标的平均数。

其次，以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统模型为依据，建立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耦合度函数^[12]：

$$C = \sqrt{\frac{U_1}{U_2}} / (U_1 + U_2) \quad (3)$$

由于耦合度指标存在漏洞，需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D = \sqrt{C \times E}, E = \alpha U_1 + \beta U_2 \quad (4)$$

式中：C 是耦合度；D 为耦合协调度；E 是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的综合发展指数，主要衡量两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 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将 α 和 β 分别取值 0.4 和 0.6^[36]。为更直观地表达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参考既有研究成果^[37]，对协调度值（D）的类型划分如下：严重失调（0.00~0.20）、一般失调（0.21~0.40）、勉强协调（0.41~0.5）、初级协调（0.51~0.60）、良好协调（0.61~0.80）和优质协调（0.81~1.00）。

3.4 实证分析

选取张家界市 1998—2018 年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共计 25 个单项指标的数据，经过计算，得到 1998—2018 年张家界全市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的综合指数和耦合度。

3.4.1 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发展综合水平

1998—2018 年，张家界市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整体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旅游地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增长趋势。1998 年旅游地发展水平值最低，为 0.180，相较而言，2008 年旅游地发展情况也不乐观，综合评价指数仅为 0.886，究其原因，主要受金融危机和湖南冰雪灾害的影响。随后，受国家颁发的相应旅游政策的影响，旅游地发展状况有了明显回升，2018 年旅游地综合评价指数达到近 10 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张家界高级别景区综合评价指数在早期增速较为缓慢，中后期稳健增长。2008 年后数值均在 1 以上，反映出张家界市高级别景区建设逐渐走向成熟的趋势。2018 年综合指数已达 1.678，发展速度处于全国中等偏上，相比 1998 年（0.4581）提高 2.7 倍。主要原因是在 2007 年后，武陵源景区入选全国首批 5A 景区，天门山、万福温泉进入 4A 级景区行列，武陵源国际度假村等一批按五星级标准建造的酒店相继试营业。

3.4.2 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系统及其相应指标的耦合演化过程

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基本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由失调逐步走向优质协调。

①一般失调阶段（1998 年）。张家界市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耦合发展在此期间虽然处于失调期，但旅游地系统与高级别景区系统的协调度从 0.395 增至 0.472，呈良性发展态势。张家界市刚成立 10 年，人口基数小，旅游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但是依托于自身优越的资源禀赋，故在此时期并未出现严重失调。

②勉强协调阶段（1999—2000 年）。仅有两年为勉强协调阶段，成为失调到初级协调阶段的过渡期，旅游地成长和高级别景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快速上升。1999 年的“穿越天门”飞行特技表演使张家界名闻天下，同年国家调整法定节假日总天数。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发展也逐渐得到提升。

③初级协调阶段（2001—2004 年）。旅游地系统与高级别景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从 0.5 增至 0.579，达到初级协调水平。此阶段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大量扶贫资金的投入和政府政策的放宽皆对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协调度提升

具有重要作用。

④良好协调阶段（2005—2011 年）。耦合协调度由 0.621 增长至 0.748，呈直线上升状态，第三产业 GDP 比重由 54%上升至 61.1%，旅游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符合张家界“旅游立市”的特色。同时举办了国际音乐乡村周等系列热点营销活动，并开通至韩国釜山国际航空快线，强化运营景区智慧管理系统，大大增加了张家界的国际吸引力。

⑤优质协调阶段（2012—2018 年）。耦合协调度由 0.816 增长至 0.912。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发展已日益契合，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人均 GDP 年均增长 12.4%，区域经济达到较高水平。旅游地设施设备条件日益改善，产业分工不断精细，旅游服务品质得到大幅度提升。

3.4.3 截面耦合度分析

通过 ArcGIS10.2 软件绘制 1998、2005、2012 和 2018 年张家界地区各区县的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图（图 2）。从空间上看，耦合协调度差异随两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但空间分异格局仍明显，表现为南部优于北部。其中，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以国际旅游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地的快速成长为基点，慈利县和桑植县较落后于武陵源区和永定区。究其原因，是由于武陵源区处于“一统”阶段时，将分散的索溪峪、天子山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三个旅游生长点实行统一管理，形成全新旅游地生长点。后来，武陵源与天门山成为国家 5A 级景区，通过形成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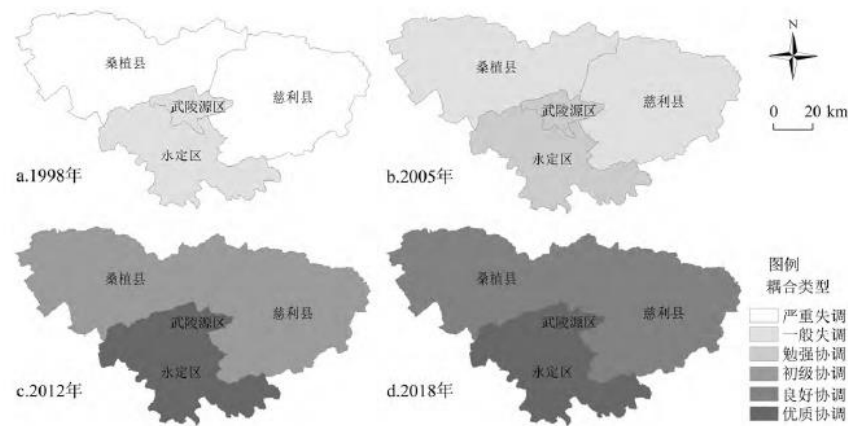


图 2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

4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耦合路径及机制

4.1 耦合路径时序变化

4.1.1 耦合初期：自然耦合路径

1980 年代之前，张家界基本上依靠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然而农业资源并不富足，基本生活资料不能自足，大庸、桑植、慈利三县被列入贫困县名单。1980 年代后，大庸县、桑植县与慈利县三县政府对张家界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景区竞相开发，形成三足鼎立局势。1988 年成立大庸市，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天子山隶属于新成立的武陵源区，实现从三分到一统的转变，张家界市以自组织形态由无序向有序前进。张家界地区与高级别景区之间的耦合关系从自组织演化发展内在规律机制出发，受外界影响程度低，旅游地发展水平稳定增长。

4.1.2 耦合中期：可持续发展耦合路径

1992 年武陵源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大量资金介入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使武陵源景区空间结构逐渐扩大。1999 年张家界国际航线开通，其国际知名度大大提升，国内外游客急剧增加，景区环境不堪重负。2013 年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张家界政府意识到必须要由传统的大众旅游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在拆除人造景观和保护景区原生景观的同时，大力实行景区限流方针，贯彻生态旅游理念，推动旅游地与景区的可持续性发展进程。

4.1.3 耦合后期：差异化资源发展路径

张家界政府主要实施“错位发展”的战略部署。拥有丰富资源的慈利县以张家界大峡谷为核心，向江娅温泉、龙王洞等景区辐射发展，填补张家界休闲度假产品缺失的空白。桑植县以弘扬红色文化为主，免费开放贺龙故居。永定区的天门山景区注重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与拓展，形成了独具匠心的“天文化”，如“天门洞开”“天悬栈道”以及“天门狐仙”等。武陵源区依托大量客流进行资源深度开发，如对魅力湘西文化广场、中国大鲵科技馆等全新文化景点的建设。

4.2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分析结果，可知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有内部作用机制的影响，还受到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政府政策等外部作用机制的影响与作用（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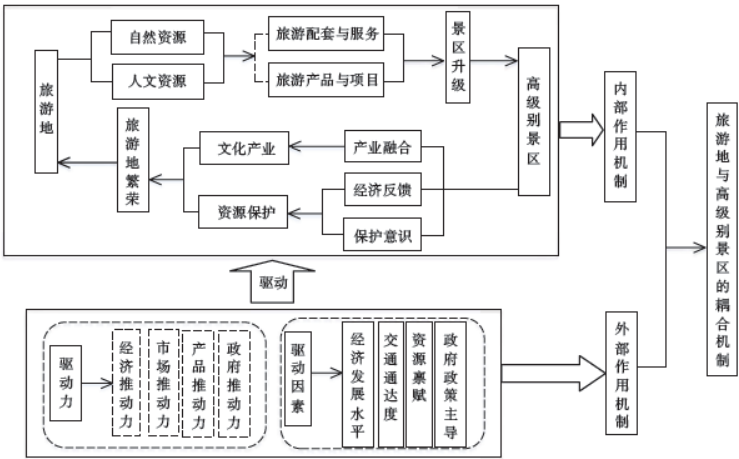


图 3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机制

4.2.1 内部驱动机制

旅游地不仅是资源开发的重要前提，也是高级别景区形成的重要载体。旅游地通过对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形成高级别景区，作用路径如图 4 所示，包括旅游资源规划、开发、经营、升级四个环节。高级别景区通过利用空间溢出效应促使周边邻近景区得到发展，促进了旅游地资源保护和传承，并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但高级别景区的发展也会造成旅游地环境质量下降和人口管理混乱，当地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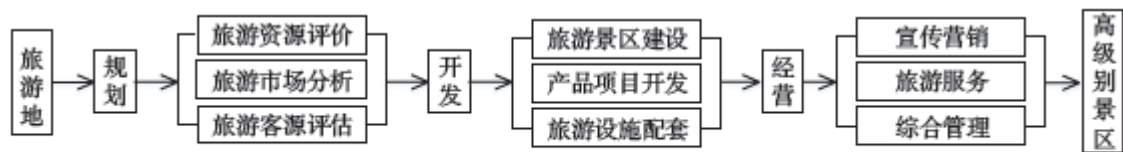


图4 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转化路径

4.2.2 外部驱动机制

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张家界以第三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凭借旅游业实现全面相对脱贫。区域经济发展为高级别景区的形成提供依托，随着张家界旅游规模的扩大，当地的旅行社和星级酒店数量显著增加，旅行社数量从1998年的32家增长至2018年的135家，旅游收入由早期的6.56亿元上升为2018年的756.8亿元，大大促进旅游地服务设施的完善。

②资源禀赋是决定旅游地开发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要前提条件。资源禀赋是旅游地成长的重要前提，也是旅游景区的重要依托^[22]。一方面，优质的旅游资源有利于旅游地自然环境形成规模化发展，提升旅游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旅游地的快速成长必然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景区的交通条件。

③交通条件优化改善了区域发展旅游的环境。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旅游地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进一步形成高级别景区奠定基础。近年来，张家界市与周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3小时交通圈得到有效构建，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立体交通网络基本打通，凸显其经济区地理位置优势（图5）。



图5 张家界市交通出行示意图

④政府政策推动旅游地开发与建设。政府政策是中国发展旅游业重要因素。通过招商引资不断改善旅游地基础服务设施，吸引项目投资。张家界市政府对于当地第三产业的投资由1998年的6.39亿元增至2018年的262.26亿元，并在大力完善与推广“张家界地貌”旅游观光品牌以及以“天门狐仙”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牌的基础上，推出迎合消费市场喜好的旅游产品，为高级别景区形成提供发展动力，进而为耦合协调度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通过构建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张家界市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度,以明确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类型,为旅游地高级化发展奠定分析基础。研究发现:

①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两个系统的耦合特征明显,各要素互为依托,彼此作用,使得两者有机发展。一方面,旅游地作为景区的载体,旅游地成长推动了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进程;另一方面,高级别景区的形成成为旅游地的发展奠定了高知名度基础。

②从时间上看,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耦合度线性持续增长,实现了从失调阶段—协调阶段—优质协调阶段的转变。

③张家界高级别景区形成过程虽然在整体上实现缓慢增长,但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耦合形成过程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地处南部的武陵源区和永定区耦合协调度等级远高于北部的桑植县和慈利县。

④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路径有三条:自然耦合路径、可持续耦合路径和差异化资源耦合路径。两系统的耦合过程既有内部作用机制的影响,还会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政府政策等外部作用机制的影响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外部驱动因素的动力强弱决定了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耦合程度的高低。

5.2 讨论

本文着重分析了张家界不同阶段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的耦合特征,为了解旅游地成长和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驱动因素提供一定的借鉴。从耦合视角,分析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时空演化过程以及耦合路径和形成机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探讨在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耦合作用的影响,不但有利于了解旅游地的成长以及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趋势,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上响应新兴旅游地发展战略和旅游经济发展需求,改变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欠发达城市落后面貌。同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关于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时序特征分析局限于成长周期,所得结论需要更多实证支持,需更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Buhalis D. Marketing the competitive destination of the future[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 (6) :97-16.
- [2]Poirier R. A. Political risk analysis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21 (3) :675-86.
- [3]Prideaux. The role of the transport system in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 (1) :53-63.
- [4]王兆峰, 史伟杰, 苏昌贵. 中国康养旅游地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 (11) :198-209.
- [5]陶慧, 张梦真. 乡村遗产旅游地“三生”空间的主体价值重塑——以广府古城为例[J]. 旅游学刊, 2021, 36 (5) :81-92.
- [6]麻学锋, 刘玉林, 谭佳欣.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0, 40 (12) :2019-2026.
- [7]姚宏, 郭雪梅.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成长波动与驱动因素——以平遥、曲阜与承德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6, 44 (4) :94-101.
- [8]虞虎, 刘青青, 张希月. 成长型城市旅游地休闲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机理研究——以合肥市为例[J]. 城市规划与设计,

2017(2):38-45.

[9]Emil J,Sara D.Drivers of pro-environmental tourist behaviours aren't universal[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26(4):121-166.

[10]Emanuela M,Rafaele P. Different tourists to different destinations:Evidence from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9(6):71-83.

[11]王明利. 基于 GIS 的中国高级别旅游景区(点)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2013.

[12]唐新平, 刘彬, 麻学锋.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成长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37(5):52-60.

[13]刘雨婧, 杨建, 罗钰坊, 等. 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家界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1):133-138.

[14]高楠, 王琳艳, 马耀峰, 等. 旅游业驱动下世界文化遗产依附地城镇化响应机制——以平遥古城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4):199-207.

[15]汤礼莎, 贺清云, 朱翔. 长沙市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J]. 经济地理, 2018, 38(6):219-224.

[16]张杰, 麻学锋.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4):879-892.

[17]李冬花, 张晓瑶, 陆林, 等.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5):70-80.

[18]吴清, 李细归, 吴黎, 等. 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2):194-200.

[19]麻学锋, 杨雪.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9):1902-1916.

[20]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J]. Canadian Geographer, 1980, 24(1):1-5.

[21]刘玮, 吕斌.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跨行政区历史文化资源整合路径——以曲阜、邹城、泗水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3):70-76.

[22]阎友兵, 张颖辉.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湖南旅游系统演化分析[J]. 经济地理, 2012, 32(1):171-176.

[23]李扬, 汤青. 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述评[J]. 地理研究, 2018, 37(8):183-198.

[24]何艳冰, 张彤, 熊冬梅.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及差异化振兴路径——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0):230-239.

-
- [25]麻学锋,孙根年,马丽君.旅游地成长与产业结构演变关系——以张家界为例[J].地理研究,2012,31(2):245-256.
- [26]刘少和,梁明珠.环大珠三角城市群游憩带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路径模式——以广东山海旅游产业园区建设为例[J].经济地理,2015,35(6):190-197.
- [27]Darwish A,Burns P.Tourist destination reputation:an empirical definition[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19(1):1-10.
- [28]田瑾,明庆忠.山地旅游目的地“山—镇”双核结构空间联系及耦合机理——来自云南丽江的案例剖析[J].经济地理,2021,41(1):212-220.
- [29]曹方东,黄震方,黄睿,等.江苏省高速公路流与景区旅游流的空间关联及其耦合路径[J].经济地理,2021,41(1):232-240.
- [30]刘庆芳,王兆峰.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压力耦合与解耦态势[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1,37(2):128-134.
- [31]李悦铮,牟方元,梁娟.湿地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J].经济地理,2019,39(1):195-200.
- [32]王慧.东北旅游景区效率的时空差异分析与路径选择——基于优质旅游有效供给[J].社会科学家,2019(12):70-76.
- [33]刘晓静,梁留科.地质公园景区科普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以河南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7):182-189.
- [34]吴玉鸣,张燕.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资源科学,2008,30(1):25-30.
- [35]丛晓男.耦合度模型的形式、性质及在地理学中的若干误用[J].经济地理,2019,39(4):18-25.
- [36]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旅游学刊,2013,28(1):62-68.
- [37]李琼,赵阳,李松林,等.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J].地理研究,2020,39(6):171-187.